

鲁迅研究丛书

鲁迅 历史观 探索

黄侯兴 著

鲁迅研究丛书

鲁迅历史观探索



黄侯兴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948478

鲁迅研究丛书

鲁迅历史观探索

黄侯兴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西安昆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375 插页2 字数141,000

1983年10月第1版 198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

统一书号: 10094·469 定价: 0.82元

第一章 前期历史观的形成

一 鲁迅是谁

鲁迅是谁？

瞿秋白同志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首先提出了这个看来平常然而却是很重要的问题。它关系到我们应该怎样正确认识鲁迅的本质，怎样正确理解鲁迅一生的战斗特点，怎样正确评价鲁迅对于中国现代文化所作出的伟大贡献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也是我们研究鲁迅历史观首先要探索的根本问题。

鲁迅是谁？

瞿秋白先讲了一个古罗马的神话：亚尔霸·龙迦的公主莱亚·西尔维亚被战神马尔斯强奸后，生下一胎双生子——罗谟鲁斯和莱谟斯。这两兄弟一出娘胎就被丢在荒山里，幸好一只母狼用乳汁喂养了他们。但是，后来罗谟鲁斯创造了罗马城，却完全忘记了自己的乳母是野兽，他乘着大雷雨飞上天去，做了军神。莱谟斯相反，他永远没有忘记自己的乳母，他憎恶那天神和公主的黑暗世界，轻蔑那虚伪的自欺的纸糊罗马城，长久地在“孤独的战斗”中找寻着回到“故乡”的道路，并终于在“故乡”的荒野里找到了群众的野兽性，回到了狼的怀抱。虽然他后来被罗谟鲁斯杀害了，但他确实找到了扫除奴才式的家畜性的铁扫帚，找到了真实的光明的建筑——伟大的簇新的星球。

↓

讲完这个神话故事以后，瞿秋白说道：

是的，鲁迅是莱谟斯，是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而同时也是一些浪漫谛克的革命家的诤友！他从他自己的道路回到了狼的怀抱。

这可以说是形象地概括了鲁迅前期的本质特点，深刻地剖析了鲁迅后来成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历史根源。

鲁迅诞生时，上距鸦片战争四十年，距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十七年，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急速的动荡和深刻的变化。一方面，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一个古老僵化的封建帝国开始解体，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中国“闭关自守”的铁门被敲开了，变为“门户洞开”的市场；另一方面，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虽然严重动摇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根基，但由于反革命力量超过了革命力量，在外国帝国主义支持下，这次革命终于被镇压下去，清王朝政府得到了一个暂时喘息的机会。

就在这样一个表面平静却潜伏着深刻危机的历史氛围中，鲁迅度过了他的幸福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鲁迅的家族，曾有过购地建屋、设肆营商、广置良田的阔绰时期。虽然在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冲击下，周家人财俱受损失，在鲁迅出生时，已由“大户”变成只有四、五十亩水田的“小康”之家，但大体还能维持生计。

但是，一八九三年，鲁迅十三岁时，家庭却遭到了意外的、重大的打击，它直接影响了鲁迅的生活和思想。

第一件事，一八九三年，鲁迅祖父周介孚因科举作弊案被

捕，经浙江省上报刑部，按光绪皇帝“钦旨”定为“斩监候”，被关进杭州监狱。周家这时不得不卖田当物，寄钱到北京和杭州设法营救。从此，鲁迅家境坠入困顿。而且，由于怕受株连，鲁迅不得不辍学，避居外婆家。他因此遭到一些亲戚的白眼，“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他初次体验到世态的炎凉。避居乡间，也使鲁迅有机会了解劳动农民的苦难生活。如受地主逼债上吊的雇农，受东家鞭打的盐工，因失去儿子而把眼睛哭瞎的寡妇，因贫穷而被夫家劫走的姑娘等等。这是在鲁迅眼前初次展现的一幅凄凉、萧索的农村生活图景，他看到了劳动人民的悲苦命运与遭际。鲁迅后来说：“我生长于都市的大家庭里，从小就受着古书和师傅的教训，所以也看得劳苦大众和花鸟一样。有时感到所谓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腐败时，我还羡慕他们的安乐。但我母亲的母家是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和花鸟并不一样了。”^①

另一件事是鲁迅十四岁时父亲患肺病，卧床不起，拖了两年多，为庸医所误，于一八九六年病故。在这几年里，鲁迅经常“在侮蔑里”出入于当铺和药店，家境更加困窘，“渐至于连极少的学费也无法可想”。鲁迅后来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②他对于上流社会地主豪绅、官僚资本家的反动本质与虚伪面目，“似乎心肝也有些了然”。

家庭的衰败，虽然使鲁迅一家的生活发生了逆转，但对鲁迅的成长说来，确是一件好事——它培育了鲁迅从小就具有劳

① 《集外集拾遗·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

② 《呐喊·自序》。

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引导着鲁迅沿着追求民族民主解放的革命民主主义道路前进。瞿秋白说：“他的士大夫家庭的败落，使他在儿童时代就混进了野孩子的群里，呼吸着小百姓的空气。这使得他真象吃了狼的奶汁似的，得到了那种‘野兽性’。他能够真正斩断‘过去’的葛藤，深刻地憎恶天神和贵族的宫殿，他从来没有摆过诸葛亮的臭架子。他从绅士阶级出来，他深刻地感觉到一切种种士大夫的卑劣，丑恶和虚伪。他不惭愧自己是私生子，他诅咒自己的过去，他竭力的要肃清这个肮脏的旧茅厕。”^①鲁迅自己后来也说：“我的祖父是做官的，到父亲才穷下来，所以我其实是‘破落户子弟’，不过我很感谢我父亲的穷下来（他不会赚钱），使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②鲁迅较早地跨进了社会人生的大门，走到劳动群众中间去，直接体察到了现实社会尖锐的阶级对立和阶级压迫，使他熟悉劳苦大众的爱憎和要求，并代表他们发出反抗与挑战的呼声。而且，由于他呼吸到了小百姓的空气，使他在研读中国史书时，能够自觉地摆脱封建士大夫阶级的偏见，卸掉心身背负的古旧的社会积习与精神传统，在他早期历史观中就具有难能可贵的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

一八九四年，甲午战败后，清朝政府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马关条约》，洋务派的“新政”破产了，李鸿章的卖国贼面目暴露了。由于民族危机的刺激，从此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得到了发展。在文化战线上，同代表封建阶级旧文化的“旧学”相对立的“新学”的影响，迅

①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②致萧军（1935年8月24日），《鲁迅全集》第13卷，第19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速扩大，变法维新的思潮一时传布全国，它也一度激起了鲁迅追求真理的热望。鲁迅不顾别人的“奚落”和“排斥”，决心“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于一八九八年五月，离开绍兴去南京，先在江南水师学堂后改入南京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求学。

在这两个学堂读书的三年半时间里，鲁迅比较系统地学习了当时传进中国的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初步形成他早期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同时接触了苏格拉底、柏拉图、斯多噶等古希腊哲学家的著作和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资产阶级民主平等思想。尤其是读严复译述的赫胥黎的《天演论》（今通译《进化论与伦理学》），更使他感到惊异：“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侏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①

鲁迅接受《天演论》中的进化论思想，不是“照单全收”，而是汲取它的合理的因素，以“进化的途中总须新陈代谢”来批判洋务派、改良派。进化论成了鲁迅前期进行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思想武器，他从生物进化这个思想中，形成了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的历史发展的进化观念。但是，应该指出，鲁迅嗜读《天演论》，是带着明显的时代印记的。当时，在中日甲午战争清廷失败后，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许多爱国志士都在考虑：中国会不会灭亡，是否仍可以奋发图强？严复在译述中，通过每章的按语，直抒胸臆，慷慨激昂地呼吁：只要发愤，变法自强，中国仍能得救，存亡生死，其权仍操之于我！这在当时，犹如警钟长鸣，极大地振奋了广

^① 《朝花夕拾·琐记》。

大的爱国革命人士，它也激发了鲁迅发愤自强的爱国热情。所以鲁迅后来提起此事，还说他“佩服严又陵究竟是‘做’过赫胥黎《天演论》的，的确与众不同；是一个十九世纪末年中国感觉锐敏的人”。^①

鲁迅初到南京，曾经相信变法维新思想，阅读了不少鼓吹变法维新的书报。如一八九六年黄遵宪等人在上海创办的《时务报》，一八九七年严复在天津创办的《国闻报》，一九〇〇年留日学生杨廷栋等人在日本创办的《译书汇编》等，都是他经常翻阅的报刊。但是，戊戌变法运动的失败，义和团运动的爆发，以及后来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使鲁迅对资产阶级改良派产生了怀疑，并开始采取批判的态度。

戊戌变法的失败，证明了改良主义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代之而起的是“排满”革命和民主共和的新思潮。它促使许多爱国的知识分子走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

鲁迅在矿路学堂毕业后，经江南督练公所审核，于一九〇二年四月至一九〇九年八月，在日本留学。这时期，正是辛亥革命的准备阶段，大批的革命党人聚集日本，排满活动的各种集会、演说，时有举行，各种报刊也纷纷出版。资产阶级革命派同改良派围绕着要不要反清，要不要民主共和，要不要改革封建土地制度等重大政治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对于“排满的学说和辩子的罪状和文学狱的大略，是早经知道了一些”^②的鲁迅，在这场斗争中，旗帜鲜明地站在革命派一边。留日八年间，鲁迅一直与光复会、同盟会保持联系，并加入光复会，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① 《热风·随感录二十五》。

^② 《且介亭杂文末编·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鲁迅到日本后，在东京弘文学院的江南班学习。在排满运动蓬勃兴起的革命形势鼓舞下，一九〇三年，鲁迅毅然剪掉了象征种族压迫的发辫，并特意拍了一张“断发照”，在照片背面写了《自题小像》一诗：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闇故园。
奇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这一首诗表达了鲁迅决心献身祖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伟大理想，抒发了他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情怀。当时，他在留日同学中曾表示：“改良必败，誓做革命之骁将”。他为实现这个理想，刻苦学习，锻炼身体。同学们感佩地说：“斯诚越人也，有卧薪尝胆之遗风。”^①

列宁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②在我们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爱国主义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一直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和作用。特别是到了近代，由于帝国主义的不断侵略，更加激起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感情。鲁迅的深厚的爱国主义感情，是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他是从历史和人民中间产生出来的人民战士、民族英雄，同时也是这一时代条件所造成的。他是在新旧民主主义革命交替中体现中国人民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最杰出的代表之一。

一九〇三年，鲁迅在译述的《斯巴达之魂》中写道：“巍

①沈颢民：《回忆鲁迅早年在弘文学院的片断》，《文汇报》1961年9月23日。

②列宁：《皮梯利姆·索罗金的宝贵自供》。

巍乎温泉门之峡，地球不灭，则终存此斯巴达武士之魂。”他在文章的按语中说：“我今掇其逸事，贻我青年。呜呼！世有不甘自下于巾幗之男子乎？必有掷笔而起者矣。”鲁迅鼓励中国青年效法斯巴达勇士的尚武精神，投身于反抗外族侵略的爱国斗争。在《中国地质略论》（一九〇三年）中，鲁迅除了用近代自然科学理论具体论证了地质地理学的重要，介绍了我国丰富矿藏的分布情况，更重要的是揭露帝国主义企图吞并中国的狼子野心。鲁迅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是近代中国一切灾难的总根源。清末的中国，是一个任凭帝国主义“得而挞楚鱼肉之”的国家；帝国主义强盗觊觎中国矿藏的情状，真如“强种鳞鳞，蔓我四周，伸手如箕，垂涎成雨”。他揭露了俄、德、匈、法、日等帝国主义为了争夺“采掘权”，纷纷派出“地质学家”、“地质勘探队”，调查我国矿藏分布的情况，指出这些披着“地质家”外衣的“天使”，实乃使“中国大陆沦陷”的狼。随着这伙强盗的“眼光足迹间”，“实涵有无量刚劲善战之军队”接踵而来。鲁迅对帝国主义者这种无耻的侵略行径，表示了极大的民族义愤。他压抑不住心头的怒火，大声疾呼：“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险；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者也。”这些论述，充分体现了鲁迅早期强烈反帝爱国的精神。

在鲁迅看来，科学和爱国是不可分的。例如一九〇三年他译述法国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幻想小说《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不只是为了向中国青年介绍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普及科学知识，而是注重于对中国人民进行思想启蒙的工作，想用科学来改变祖国愚昧、落后和贫穷的状态。正如他在《月界旅行·辨言》中所说，科学幻想小说可以“掇

取学理，去庄而谐，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知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导中国人群以进行”。他以为，借助于科学，“冥冥黄族，可以兴矣”。

鲁迅正是抱着这种“科学救国”的理想，在弘文学院毕业后，于一九〇四年九月，到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鲁迅的目的是“预备卒業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①但是祖国濒临危亡的形势，使他不可能安心地坐在教室里。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树人到仙台后，离中国主人翁颇遥，所恨尚有怪事奇闻由新闻纸以触我目。曼思故国，来日方长，载悲黑奴前车如是，弥益感喟。”^②这里所说“怪事奇闻”，即指当时在中国领土上发生的日俄战争，而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却扬言保持“中立”。鲁迅遥望风雨如晦的祖国，心潮起伏，一直在认真地思考着中国社会的改造问题。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新闻片中看到这样的镜头：日俄战争时期，一个中国人，据说当了俄国人的侦探，被日军抓获，要拉去枪决，刑场周围有不少中国人在看热闹，脸上显出麻木的神情。一些也在观看影片的日本学生却在狂呼“万岁”。鲁迅不堪忍受这种侮辱和刺激，茫然若有所失：多少同胞被帝国主义者杀戮了，而中国人却还在沉睡着！中国什么时候方能掀起大波，发出刚健抗拒挑战之声呢？他终于得出结论：

① 《呐喊·自序》。

② 致蒋抑卮（1904年10月8日），《鲁迅全集》第11卷第32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①

鲁迅认为，改变人民的精神远比健全人民的体格更重要，因而文艺也比之医学更急需。所以，鲁迅放弃学医转而从事文艺，把唤醒人民的觉悟、改变民族的精神面貌，看作“第一要著”。这既是他在事业选择上的重大变化，也是他在思想上一次巨大的飞跃。

康梁的维新运动，一度激起了鲁迅追求真理的热望，使他抛弃了孔孟，决心走异路，学洋务，服务于兴业振兵；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浪潮，又冲刷了维新思想的影响，使他离开了康梁；现在又弃医就文，以一个杰出的民主战士和启蒙思想家的英姿，驰骋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文化战线上。这是鲁迅早期在生活道路上经历的三个转变。每次转变，不仅鲜明地体现了他的深刻的爱国主义思想，同时也是他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的结果。它具有鲁迅个人的思想特色。

鲁迅选择文学事业，致力于改造社会、改良人生的思想启蒙工作，把追求人的个性解放，探索国民愚弱的病根，以启迪民族的觉醒，置于“立国”的根本之道。这应该说是鲁迅当时另辟蹊径、以启新机所可能做出的独特贡献。

① 《呐喊·自序》。

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在于，当革命派的许多志士热衷于狭隘的排满种族革命，偏重于政治活动，害着“议会迷”的病症，严重脱离群众的时候，鲁迅却非常重视人的价值和人的社会作用，他不仅止于政治革命，而且更强调思想革命，他用历史的眼光正确地对待政治革命与思想革命的关系，把精力放在思想、理论工作的清算和建树上。这是当时许多醉心于恢复“汉官威仪”的革命志士们所不能企及的地方。

早在日本弘文学院时期，鲁迅根据历史和现实的教训，提出了下面三个相关的问题：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①这是鲁迅探索改造旧中国的道路的开始，也是他终其一生要加以解决的重要课题。此后，在一九〇七、一九〇八年间，他陆续发表了《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辉煌论著，通过研究人的发展历史，考察西方科学文化的渊源，以及比较中国的现状，提出了“二十世纪之新精神”，在于维护人的尊严，光耀人的精神生活，明白人生的意义。今日中国，“情状自不能无所变迁”，必须“立狂风怒浪之间，恃意力以辟生路”。他认为，“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②他根据“人文史实之所垂示”，强调必须“致人性于全”，^③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愚弱的现状。他说：

……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

①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

②《坟·文化偏至论》。

③《坟·科学史教篇》。

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國中，翕合無間。外之既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人生意義，致之深邃，則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轉為人國。人國既建，乃始雄厲無前，屹然獨見於天下，更何有於膚淺凡庸之事物哉？

……生存兩間，角逐列國是務，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①

魯迅提出的“立人”——建立“人國”的理想，是充滿着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色彩的，是為反對封建統治階級長期禁錮人民群眾思想、壓制人性的健康發展而提出的一個思想啟蒙運動的理論綱領。這個理論綱領的最終奮鬥目標，是要把中國改造成為具有“最理想的人性”的國家。

為了“立人”，魯迅認為：第一，要徹底蕩滌古老中國“安弱守雌，篤於舊習”、“抱守殘闕，以底於滅亡”②的一切污泥濁水；要蔑棄那種迷戀往古，叫人“致槁木之心，立無為之治”，③造成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停滯、落后的古訓。第二，要揭露那些“辱國害群”的“輕才小慧之徒”，指出他們所謂的“文明”，實則是“借新文明之名，以大遂其私欲”，講“富強”，則是“假力圖富強之名，博志士之譽”，講“國會”、“立憲”，則是“勢利之念昌狂於中”，講“福群”，則是“托言眾治，壓制乃尤烈於暴君”。這些投機政客，疾恨

①②《墳·文化偏至論》。

③《墳·摩羅詩力說》。

人才，扼杀精神，“个人之性，剥夺无余”。^①只有揭露他们的虚伪和欺骗，才能“立人”。第三，要改造国民性：医治国民盲目自大的病症（“仅自语其前此光荣，即以形迹来之寂寞”）；批判国民不敢正视自己的奴隶地位的懦弱性格（“吾中国爱智之士，独不与西方同，心神所注，辽远在于唐虞，或迳入古初，游于人兽杂居之世；谓其时万祸不作，人安其天，不如斯世之恶浊阽危，无以生活。……故作此念者，为无希望，为无上征，为无努力”，“其意在安生，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②鲁迅认为，不铲除这些障碍，“中国之沉沦遂以益速矣”；只有启迪民族的自觉，培养国民具有“排斥万难，龟勉上征”的品格，成为“勇猛奋斗之才”，“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③

鲁迅早期的“立人”思想，包括他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虽然还带有抽象的空想的性质，但是鲁迅所提出的问题，却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的，具有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一方面，他洞达世界之大势，为了引导国民“不后于世界之思潮”而提出“立人”的思想；另一方面，他深入探究中国之国情，“弗失固有之血脉”，摸索着改革中国现实的途径和方法。这就使他的“立人”思想，成为适于中国国情、具有民族特色的新思想。正因为此，鲁迅的现实感就必然地使他着重于揭露国民性的弱点及其根源，从而和他所执行的反封建的思想革命结合起来。

鲁迅集中研究国民性问题，是在五四运动前后。他分析了

①③ 《坟·文化偏至论》。

② 《坟·摩罗诗力说》。

“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①批评了“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那一面，但又属于无论那一面”，只求“可上奴隶的轨道”。^②他认为，“中国国民性的堕落，……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远，加以‘卑怯’与‘贪婪’，但这是历久养成的，一时不容易去掉”；^③“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④考察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成因，不难看出，他的本意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写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⑤他从实行“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出发，希望中国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⑥“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⑦目的是为了唤起国民的觉悟，使我们民族能有转机，期待着“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⑧虽然鲁迅对于启发一切人众觉醒的道路还不明确，但却坚信这条路是存在的。他说：“我对于‘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不是国家的相待，才得永久和平，但非从民众觉醒不可’这意思，极以为然，而且也相信将来总要做到。”^⑨这说明“五四”前后鲁迅研究国民性的立场和态度是积极的，是从“立人”这一原则出发的。

① 《坟·论睁了眼看》。

② 《坟·灯下漫笔》。

③ 《两地书·一〇》。

④ 《两地书·八》。

⑤ 《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

⑥ 《华盖集·题记》。

⑦ 《两地书·一七》。

⑧ 《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

⑨ 《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鲁迅全集》第10卷第192页。